

《人民日報》霧霾新聞框架建構（2011-2017）

李子甜、徐美苓*

投稿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通過日期：2019 年 10 月 26 日。

* 李子甜為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

徐美苓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特聘教授，臺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
email: mlshiu.mlh@gmail.com。

本文引用格式：

李子甜、徐美苓（2020）。〈《人民日報》霧霾新聞框架建構（2011-2017）〉，
《新聞學研究》，142: 59-109。

DOI: 10.30386/MCR.202001_(142).0002

《摘要》

近年霧霾問題廣受中國社會與媒體關注，也引起傳播學界重視。鑑於霧霾議題的既有媒體框架研究並未完整闡明框架的建構過程與邏輯，本研究透過 van Gorp 質量兼具的新聞框架分析取徑，耙梳出《人民日報》2011-2017 年共 575 則霧霾報導的框架類型及其建構過程。研究發現《人民日報》傾向以強調人民行動的環境及政府作為二框架報導霧霾議題；報導立場多借重官方與專家學者，然在不同框架論述中有不同的運作力，映照出作為中國政策風向球主流官媒之新聞建構背後的政治與文化因素。本研究最後提出新聞實務與研究延伸建議。

關鍵詞：人民日報、框架分析、新聞、環境傳播、霧霾

壹、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現代工業文明帶動社會進步的同時，改變了人與環境的關係，也帶來一系列的污染問題。以空污為例，各國或地區污染主要來源和構成雖不盡相同，卻存在相似之處，即社會現代化與工業化發展均為主要肇因（高娜，2015；楊小陽、白志鵬，2013；Afroz, Hassan, & Ibrahim, 2003；Brunekreef & Holgate, 2002；Massey, 2000；Wang & Liu, 2014）。

霧霾問題在中國大陸也並非新事物，但直到近幾年才受到社會輿論關切。2015年2月，正值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前中央電視台著名調查記者柴靜自費拍攝了一部霧霾的深度調查紀錄片《柴靜調查：穹頂之下》。此片上線48小時內，各視頻網路平臺播放量總和超過兩億次（向密，2015年3月2日）。該紀錄片迅速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探討，足見媒體在推動社會公眾感知和關注霧霾議題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事實上，中國大陸各媒體自2011年來便有不少與霧霾相關的訊息，其中具備專業性及權威性的新聞報導是一般民眾瞭解此議題的重要方式，特別是在城市地區（Cheng, Wei, & Ge, 2017）。因此，若欲探討新聞報導對民眾產生何種影響，需先關注訊息如何被呈現於公眾面前，亦即媒體如何報導霧霾問題。

再來，中國大陸對霧霾污染的社會關注迄今八年餘，相關報導可能已形成相應的定式或規則，可能產生新的變化，故重新檢視霧霾議題的新聞建構過程自有其必要性。過去不少國內外學術研究重點多在分析傳統媒體與網路新媒體中霧霾議題如何被建構、擴散與傳播、達到何種效果（岳璐、方世榮，2016；曾繁旭、戴佳、鄭婕，2013；趙思茹，2016；劉宇晨，2017；Chen, 2014；Chris & Elizabeth, 2015；Duan &

Takahashi, 2017)。鑑於框架乃作為媒體與閱聽眾呈現與理解社會現實的重要工具，本研究欲奠基於過往相關研究成果及其力有未逮處，從整體的社會情境與脈絡入手，以報導框架的角度剖析霧霾議題的新聞建構邏輯，並探討影響媒體呈現與框架建構的機制。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回顧的文獻範疇包括兩大部分：(1) 檢視霧霾議題的中國大陸媒體再現研究，總結既有研究之不足與本研究可繼續發展探討之處；及 (2) 從框架理論入手，討論 Baldwin van Gorp (2007, 2010) 的新聞框架分析取徑在本研究分析中的適用性。最後則根據以上討論彙整出本研究欲回答的研究問題。

一、霧霾議題的媒體再現

(一) 中國大陸霧霾問題的媒體再現研究

在中國大陸媒體的霧霾議題再現研究中，若以媒體類型劃分，有網路媒體與傳統媒體兩類，其中網路媒體研究大致呈現兩個方向：一為網路新聞媒體上霧霾訊息的單向傳播，以分析具體的報導內容為主，且普遍認為新聞網站的報導多傾向於淡化霧霾問題成為社會危機（尹忠偉，2014）。

另一網媒再現研究方向為探討社群媒體上霧霾議題的內容呈現與訊息雙向流動。部分研究從公眾自我表達角度分析社群媒體中霧霾訊息的內容和形式（劉宇晨，2017; Huang, 2017; Zhang, 2017a），例如 Zhang (2017a) 發現社群媒體可促進公眾參與霧霾議題討論，並有助於議題

的廣泛傳播；也有研究反思社群網站提供的自我賦權與表達形式能否有效承擔公眾參與的責任，例如霧霾「段子」（以幽默、調侃的方式說明社會或環境問題並表達意見）的出現，前期以調侃霧霾問題為主，後期則質疑如此短貼文的表達模式會帶來過度追求文字吸引力的「形式狂歡」，進而失去公眾對討論議題之意義（劉宇晨，2017）。

就社群媒體霧霾貼文的內容而言，當空污被形塑為威脅人類健康時，相關訊息可傳播得更廣，此意味污染與自身利益的關聯可促進閱聽眾對議題的關注。另有研究發現國家對於批評政府的負面貼文審查並未如想像中嚴格，顯示中國政府已從完全壓制負面訊息轉向可容忍對污染的負面評論（Chris & Elizabeth, 2015）。

第二種以媒體類型區分的霧霾再現研究是在傳統媒體中，這也是佔目前中國大陸霧霾再現研究比例最大宗者。這些研究有從新聞的報導策略、媒介倫理、以及風險社會理論等面向切入（田棟、任占文，2016；岳璐、方世榮，2016；張伏，2016；Liu & Li, 2017），例如從風險傳播的角度看，《南方週末》的霧霾報導在風險歸因上將責任歸於黨政機構與制度政策，這被視為是媒體參與公民決策的體現（岳璐、方世榮，2016）；另有研究指出政府、專家和一些媒體傾向於將霧霾成因歸責於自然因素（王慶，2014）。

除此，有為數不少研究強調從框架角度出發，分析霧霾議題在傳統傳媒的建構（林世華，2016；徐雲方，2015；Chen, 2014；Ma, 2015）。其中曾繁旭等（2013）分析《人民日報》、《南方都市報》與《科技日報》中 PM2.5 議題的報導框架，發現在霧霾議題的若干框架中，《南方都市報》均為框架制定者，報紙間存在框架擴散的現象。Chen（2014）指出 2013 年初北京霧霾事件報導本質上反映出「問題解決」框架，承認環境污染並視霧霾為當前工業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中待解決之問題，但

這些報導並未觸及中國過去 30 年發展背後的工業化與現代化邏輯，環境正義的問題亦被忽略。

Ma (2015) 結合文本分析與焦點團體訪談，對比北京主流報紙中霧霾報導框架與公眾霧霾認知間的關係，並檢視訊息如何被建構與詮釋，發現訊息內容存在言外之意 (implication)、訊息 (information) 與解釋 (explanation) 三種框架；Ma 亦發現報紙報導內容與公眾的霧霾感知存在較大差異，後者普遍傾向於將霧霾污染視為政治議題而非環境議題予以討論。Zu (2015) 透過圖片內容和字詞分析，發現《中國日報》在霧霾議題報導中更強調後果和責任框架，對衝突和人類利益框架的關注相對較低。而 Wang (2017) 分析中國大陸 15 家紙媒，根據報導涉及的內容總結出圍繞霧霾成因之一的「秸稈焚燒」爭議的論述中，分別描述官方與民眾的四個對立框架，包括強調政府官方的成績與努力 (achievement and effort) 框架、涉及民眾焚燒秸稈行為的污染與事件 (pollution and accident) 框架、懲罰與警示 (punishment and warning) 框架，以及忽視與恣意 (ignorance and unruly) 框架等。

中國大陸媒體中霧霾議題的框架建構研究看似數量較豐，然也凸顯對「框架」的理解並無一致標準。許多聲稱「框架」分析的研究並未指明框架是如何「組織」與「建構」的，而是以「框架」替代「話題」(topic) 或新聞內容主題 (Reese, 2007)；或以不同框架功能 (Entman, 1993) 來確定框架種類 (如王慶, 2014; Wang, 2017; Yang, Wendorf Muhamad, & Yang, 2019; Zhang, 2017b; Zu, 2015)。除此，多數中國大陸霧霾新聞框架實證研究僅停留在描述性分析 (如徐雲方, 2015; Ma, 2015)，並無法體現 Reese (2007) 指出之新聞框架作為「橋接」(bridging) 工具的建構過程。另值得注意的是，框架的建構與其所處的特定情境密不可分 (Chang, Salmon, Lee, Choi, & Zeldes, 2009)，故框架分析除了闡明新聞採用的框架類型及建構邏輯外，需溯

源至更廣的社會與歷史文化情境，以探討框架形成之脈絡，這也是過往相關研究未及之處。由上，本研究欲提出較為完整的新聞框架分析架構，透過拆解霧霾議題典型框架的結構，並對應特定社會、政治或文化情境，以探霧霾議題的媒體建構邏輯。

（二）中國大陸的媒體系統與環境議題報導

欲分析中國大陸的媒體再現，則需瞭解其作為風向球的主流媒體特色。首先，由於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國情的特殊性，中國共產黨對大眾媒介這一社會輿論與宣傳工具的控制並不鬆懈，尤其針對具意識形態屬性的新聞媒體（李良榮，2007）；從 1930 年代延安時期延續至今的「黨管媒體」的辦報傳統和理念仍是新聞管理體系的核心（夏倩芳，2004）。自 1992 年市場化經濟確立後，中國的媒體制度轉變，市場化運作滲透到媒體的各方面（Chen, 2014），傳媒集團化進程亦隨之進行，但這些傳媒集團的事業單位性質並未改變（黃玉波、張金海，2006）；新聞仍是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輿論喉舌，存在審查制度（Chen, 2014; Tong, 2014）。因此，無論中國大陸新聞體制如何改革，「黨管媒體」這一核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情境下仍是新聞改革的目標與路徑（夏倩芳，2004）。

儘管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作為黨的輿論喉舌存在審查制度，卻未完全禁止環境議題的報導（Tong, 2014）。而且環境保護等公共議題需經由主流官方媒體先行報導，尤其是中央級別媒體的報導，方具備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以利其他媒體跟進（曾繁旭，2009）。在發行量前十名的全國和地方報紙中，環境議題調查報導的媒體框架差異與報紙本質（如是否為黨媒）以及報紙（如都市報等）類別的相關程度很小，即無論是否為黨報，這些報紙對環境問題的敘述大致相似（Tong, 2014）。由

此，藉由剖析具備代表性的指標主流媒體的霧霾議題框架建構過程，探討其在相關議題上的報導基調，可一探官方的政策導向，並點出媒體再現作為公眾環境風險傳播管道的侷限。

二、框架理論與新聞框架取徑

本研究另特別需強調的相關文獻涉及框架理論與分析架構。Goffman 被認為是最早關注框架研究之人，他將框架定義為「詮釋的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認為框架存在於特定的心理情境中，幫助個體定位、感知、辨認、並使議題、事件或話題標籤化（臧國仁，1999; Goffman, 1974; Nisbet, 2010），是從個體的心理層面界定框架。從社會學領域發展的角度來說，框架理論立基於社會建構論，意指社會中的事物均由人類活動形成的「社會」所產製，並非自然發生（Burgess, 2015）。傳播學領域中，社會建構主義取徑下的框架泛指媒體和公眾再現特定議題的方式（Entman, 1993; Reese, 2001）。

Gamson & Modigliani（1989）則認為媒體論述是一系列為特定議題提供意義的詮釋包裹（*package*），每個包裹存在一個核心的組織整體結構的觀點，即為框架。Entman（1993）的框架概念在媒介文本的內容分析研究中採用較廣，該概念強調框架的實質在於挑選與凸顯。立基於此，臧國仁（1999）進一步指出框架是人們或組織對外界事件的解釋或思考的結構，具有濃厚的主觀性；選擇和重組是該過程中的兩個重要機制。

致力於框架理論研究的傳播學者中，不少人認同框架分析應該置於特定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其中 van Gorp（2007）對於新聞框架與文化間關係的闡述較為全面，其架構也曾被運用於分析臺灣的少子女化現象

（徐美苓、熊培伶、吳姿嫻、施馨堯、賴若函，2010）、毒癮愛滋的新聞建構（徐美苓、熊培伶、賴若函、吳姿嫻、施馨堯，2011）及基改新聞（謝君蔚、徐美苓，2011）研究中。首先，van Gorp（2007, 2010）認為框架的文化庫存除了所運用的框架外，還有其他框架；選擇不同的框架導致對議題的定義不同，因此在框架研究中，需辨別特定社會、政治或歷史情境中的主導框架。其次，框架是文化的一部分，需區分媒體內容與框架。第三，框架在媒體內容中的使用十分自然，其社會建構的過程難以察覺。以上說明框架可與文化主題或現象產生共鳴，而這類型的框架相較於其他框架更具先天優勢，對特定文化或社會成員來說，因熟悉度和接近性更高，所以接受該框架對議題的解釋則更水到渠成。

本研究則認為所謂框架中的文化現象並非狹義上「文化」，更傾向於廣義上指社會整體的價值體系及歷史與社會情境脈絡。本研究所關注的中國大陸霧霾議題報導，因國家體制與媒介系統的特殊性，該議題的文化現象可廣義地拓展至從特定歷史、社會、甚至政策制度環境中檢視議題背後新聞框架的建構。

在新聞框架分析的操作部分，Gamson 與 Modigliani（1989）提出新聞論述的詮釋包裹可分為隱喻（metaphors）、流行語（catchphrases）、視覺圖像、道德訴求及其他象徵裝置。van Gorp（2007）進一步指出框架作為後設傳播（meta-communication）的形式之一，可透過再建構框架的方法加以檢視。他指出每個框架包裹由三個部分組成：框架裝置、推理裝置（reasoning devices）及前述提及的文化現象，即框架的核心。其中框架裝置包括字彙選擇（lexical choices）、隱喻、敘事（narratives）、論證（arguments）、描述及視覺圖像等文本中可操弄的元素，它們構成訊息的敘事與修辭結構；推理裝置則承擔 Entman（1993）提出的框架的四個基本功能，包含定義問題（defining problems）、診斷緣由／闡

釋因果 (diagnosing causes)、道德評價 (making moral judgements)、策略建議 (suggesting remedies)，著重形塑因果與邏輯路徑；一則新聞內容中的所有框架裝置均指向相同的核心觀點，即為框架。

例如徐美苓等 (2010) 分析臺灣少子女化現象的新聞框架建構，發現歸類為「時勢所趨」框架之論述，其重要問題意識為「低出生率帶來何種社會樣貌和生活環境改變？」其框架裝置部分多透過統計語言或數據，描述社會上因少子女化後資源重新分配帶來的轉變。在推理裝置的現象界定部分，此數據消長論證所欲展現的是「此消彼長」的發展，也就是在少子女化現象發生的同時，有相對的另一塊版圖正在成長。然而此類論述多使用明顯的數字告知讀者關於社會的現況，並不特別強調責任歸屬與解決方案，藉以反映出順應潮流的價值觀，以做為一種道德評估。連結上述這些框架裝置與推理裝置的中心意旨，則是對個人與家人高品質生活的強調，因應而來的商機也被視為是社會脈動的自然結果，其所對應的文化現象，「每個孩子都是寶」體現在高價位童裝與腦力開發課程等兒童商機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也逐漸被以寵物代子所取代。故與其說此類框架論述映照的是某種既有價值觀，不如說其反映了是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價值觀轉變 (van Gorp, 2007)。

在實際的框架分析時，研究者在確定框架類型前會先檢視部分分析文本，以發現其中明顯的框架裝置，包含但不限於前述提及的框架裝置類型，該部分關注故事如何被講述；之後分析文本包含的明顯或隱含的推理裝置；框架的形成則是將框架裝置與推理裝置與特定的核心觀點扣連；最後則透過量化演繹以瞭解不同框架的分佈狀況。

論及新聞框架建構，消息來源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覷。與文化現象關聯的框架本質是穩定的，但框架的選擇則是處在動態變化中，不同的公共論述進行著複雜的相互作用。van Gorp (2007, 2010) 提出框架理論的前提之一是明確框架的本質在於社會互動，例如媒體工作者與其消

息來源等在公共領域中的互動等。雖然媒體從業者有自己建構新聞故事的框架庫存，但由於從業者與其他社會行動者間存在框架競爭，可導致文本最終選擇的框架有所不同。臧國仁（1999）認為消息來源作為社會行動的競爭者之一，需要爭取在媒介中論述的主導權，因此在新聞產製過程中，媒體與消息來源共同建構議題的意義。除此，傳統新聞報導的客觀性要求記者在新聞報導中排除己見，但記者會將消息來源的意見引入報導中，新聞仍然被意見干預，只是主體轉為消息來源（Rouner, Slater, & Buddenbaum, 1995）。

消息來源作為框架提供者對新聞報導的影響甚遠。不少研究發現在科學與環境議題中，媒體的報導依賴較多的消息來源為專家或權威系統（胡之瑋，2007；謝君蔚、徐美苓，2011；Duan & Takahashi, 2017；Ma, 2015）。Gamson & Modigliani（1989）在核能議題的公共論述研究中也指出，特定議題中存在記者或其他媒體中的專家論述。在霧霾議題報導部分，有關中國大陸人民網的分析則發現最多的消息來源為政府和其他媒體，這種對特定消息來源的偏好可能形成話語霸權的局面，並直接影響該媒體對風險的歸因（王慶，2014）。至於前述提及的臺灣少子女化現象的新聞框架分析中，歸類為「時勢所趨」框架之內文多引述由店家單方描繪產業的美好願景，缺乏數據或專業人士佐證，明顯與一般純淨新聞強調平衡報導不同（徐美苓等，2010）。因此，本研究在解構霧霾議題的新聞框架過程中，亦需將消息來源納入一併檢視，在框架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該議題下不同新聞框架中的消息來源引述差異以及其對新聞論述產生的影響。

由上，本研究將依據 van Gorp（2007）的架構，剖析中國大陸霧霾報導的框架建構過程，檢視政治與社會文化情境與脈絡如何在相關報導框架中體現；進而探討消息來源與框架選擇間的影響。具體的研究問題

歸結如下：

- (1) 主流官方傳統媒體透過哪些框架再現霧霾議題？這些框架的分布情形為何？
- (2) 組成主流官方傳統媒體霧霾新聞框架的框架化裝置與推理裝置分別為何？這些新聞框架反映的社會、政治或文化脈絡又為何？
- (3) 哪些新聞消息來源在共同建構霧霾議題意義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消息來源在不同霧霾框架論述中的分布又有何差異？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人民日報》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間以「霧霾」為主題的新聞報導作為研究對象。選擇《人民日報》乃因其為中國中央級別的共產黨機關報，除了貼近國家政策方向，亦扮演媒體「監督社會」的角色。作為中國大陸主流官方媒體中發行量最大和影響範圍最廣的第一大報，《人民日報》處於輿論的領導地位，在各議題上的權威性和公信力不可小覷，環境議題亦需透過該媒體的報導以獲取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曾繁旭，2009；國家新聞廣電總局，2017 年 7 月 25 日）。除此，相對於地方報紙，《人民日報》的議題輻射範圍更廣，除了關注地方新聞，更注重議題的國家意義（張高瑋，2015）。

時間範圍的選擇乃因 2011 年後，《人民日報》在報導中明確使用「霧霾」一詞以描述因空氣中以顆粒物為主的污染物含量過高而造成能見度不佳的天氣狀況，霧霾作為特殊的空氣污染形式進入官方話語系統，故以 2011 年 1 月 1 日為起點。本研究亦著力於挖掘中國大陸傳統

主流媒體對霧霾議題的新聞框架建構過程和樣貌，需在較長的時間範圍內進行，故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研究開始進行時為迄點。

二、樣本蒐集過程

本研究以「霧霾」、「灰霾」、「治霾」、「重霾」、「減霾」、「防霾」、「PM2.5」、「PM10」、「細顆粒物」、「可吸入顆粒物」、「空氣污染」、「大氣污染」作為關鍵詞，分別輸入《人民日報》圖文資料庫，將檢索出的新聞逐一瀏覽，並進一步依以下標準篩選出 575 則分析樣本：(1) 新聞標題或內文必須出現檢索的關鍵詞，且新聞內容必須圍繞霧霾主題展開；(2) 該則新聞整體字數至少須超過 250 字；及 (3) 若以全國各地天氣訊息為主的新聞，指出報導前後時間內霧霾情況與當次霧霾的成因等內容需佔全文 50% 以上。

三、分析步驟

本研究從質化歸納和量化演繹兩個階段剖析霧霾新聞框架的形成，並扣連至相關的社會情境與文化脈絡。歸納階段透過部分樣本檢視《人民日報》中霧霾報導所使用的框架包裹，初步確定新聞中可能的框架，並繪製框架矩陣；演繹階段對所有樣本進行正式編碼，並從第一階段歸納的框架包裹中提煉並確定媒體建構霧霾議題所使用的特定框架類型。

（一）歸納階段

由於每個框架包裹都是由核心意涵、框架裝置和推理裝置等三部分構成的完整結構（van Gorp & van der Goot, 2012），歸納階段主要涉及

框架素材的編碼與蒐集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步驟：開放編碼（open coding）、根據意涵安排編碼、選擇編碼（selective coding），三個步驟間沒有序列限制，需要在整個歸納階段中不斷反覆進行。在開放編碼階段，沒有確定的編碼工具，需比對文本中的不同元素，列出其使用的框架裝置與推理裝置，以建立編碼目錄。根據意涵安排編碼階段則將前一步驟所列裝置與某個核心觀點聯結，透過異同比對與降維，抽離出新聞中的框架裝置與推理裝置。選擇編碼階段則從上述步驟萃取出欲保留的裝置元素，並填充框架矩陣。最後回頭檢視，確認報導中使用的互斥的框架類型。

（二）演繹階段

演繹階段是對新聞框架建構的量化分析，其主要目的在於驗證歸納階段建立的框架矩陣與總結的框架類型之效度。該階段將依據歸納階段的框架裝置和推理裝置建立後續內容分析使用的框架編碼指標，透過觀察這些裝置是否可在新聞文本中得以體現，以確認組成潛在框架的框架包裹元素叢集，完成編碼；之後需要考慮框架包裹的權重分配，透過量化分析確認文本中的主導框架（van Gorp, 2010）。本研究先在歸納階段透過約 100 則開放編碼抽離出的框架裝置與推理裝置，在演繹階段不斷回溯新聞文本，對照編碼以修正框架矩陣。因此本研究將分別描述不同框架的框架裝置和推理裝置，並進行編碼手冊的編寫，透過前測以確認《人民日報》在霧霾新聞報導中使用的框架類型，並計算編碼者信度；另根據本研究之需要，在分析類目中加入消息來源面向以回答研究問題。

1. 霧霾新聞框架

本研究依據框架分析歸納階段的開放編碼、安排編碼及選擇編碼三

個步驟，並參考相關研究中對框架類別的劃分（Nisbet, 2009），將研究樣本的框架類目區分為：(1) 經濟框架；(2) 環境框架，又可區分為「適應自然次框架」與「行動決定論次框架」；(3) 政府作為框架；(4) 健康框架；(5) 公眾責任框架；及 (6) 其他。¹

在編碼過程中，編碼員需以新聞文本的整體框架進行判定，每則樣本僅登錄一個最主要框架。

2. 消息來源

透過對樣本的初步觀察，並結合既有研究中的劃分標準，本研究將消息來源分為：(1) 官方機構相關單位或政治人物，又可區分為「環境」、「經濟」及「其他」三類；(2) 研究機構或學者專家，同樣可分為「環境」、「經濟」及「其他」三類；(3) 醫療機構或成員；(4) 企業或企業成員；(5) 非政府組織；(6) 一般民眾；及 (7) 其他。

由於一篇新聞可能出現不只一個消息來源，本類目分別記錄單則樣本中所有消息來源出現次數。若該類消息來源在某則樣本中未出現，則記為 0；若單篇新聞中多次引用同一來源，則記為 1 次；若出現不同消息來源屬同一類別，則分別編碼。

上述各框架與消息來源的類目定義則列於附錄。在正式內容分析前，本研究從所有樣本中隨機抽取 10%，共 57 則新聞，由兩名接受過

¹ 本研究參考 Nisbet (2009) 針對氣候變遷新聞框架分析的部分類別，並透過歸納步驟予以修正、確認本研究採納的框架類別。其中 Nisbet 研究中的經濟發展與競爭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框架經進一步修訂為本研究所採用的「經濟框架」；公共課責與治理 (public accountability and governance) 框架也經來回對照新聞文本內容，並呼應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特色，轉換為本研究所使用的「政府作為」及「公眾責任」兩個框架；道德與倫理 (morality and ethics) 框架則進一步扣連至環境主題，而修正成本研究的行動決定論次框架；至於環境框架的另一適應自然次框架則為依據中國霧霾新聞特色而衍生。

研究方法和統計訓練的編碼員進行前測，信度計算乃依據 Scott's π ，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Wimmer & Dominick, 2013)：

$$\text{信度} = \frac{\text{觀察值同意度} - \text{期望值同意度}}{1 - \text{期望值同意度}}$$

經前測計算，報導框架的信度為 .72，消息來源信度為 .85，兩者的整體信度則為 .79，均在一般社會科學研究可接受的範圍。

肆、分析結果

一、霧霾新聞框架建構與分布

研究問題一關切的是作為主流官方傳統媒體的《人民日報》，其霧霾報導的框架建構與分布。本研究首先透過質化歸納方式，彙整出「經濟」、「環境」（含「適應自然次框架」和「行動決定論次框架」）、「政府作為」、「健康」、及「公眾責任」等五類六個報導框架。在這個階段，我們除了明確指認框架包裹的三個組成部分，也運用 van Gorp (2007) 提出的框架分析矩陣 (matrix) 的操作概念。一如表 1 所示，矩陣的每一縱「欄」呈現單一框架；每一橫「列」為相應的框架裝置與推理裝置，其中字彙、描述、隱喻等在文本中可操弄的元素建構了訊息的敘事與修辭結構，即框架裝置；推理裝置則著重形塑因果與邏輯的路徑；框架與推理裝置二者共同指向一致的文化現象 (van Gorp & van der Goot, 2012)，在本研究中則為新聞框架反映的社會、政治或文化脈絡。本研究會在下一小節進一步討論與闡釋這些框架矩陣各要素的特色及其組合。

表 1 (續)

框架名稱	環境		政府作為	健康	公眾責任
	經濟	適應自然			
問題 定義 ／ 現象	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對大氣環境產生不良影響。	霧霾污染本質上是氣象自然問題。	霧霾問題屬政府行政管理範圍內的民生問題。	霧霾問題實際是健康問題。	因應霧霾中的公眾參與欠缺。
道德評價	經濟發展與霧霾解決可以兼得。	人類需順從自然變化，不可與之抗衡。	為人民創造更好的生產生活環境是政府職責所在。	為保證民眾健康生存的權力，應及時正確防範霧霾。	公眾具有履行保護環境的責任和義務。
因果闡釋	應對霧霾會影響當前經濟，但長遠可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氣象與自然環境不佳，霧霾難以消除。	政府規劃與措施存在不足，以致霧霾難以消除。	曝露於霧霾空氣中可誘發人體系統疾病。	公眾缺乏環境意識與環保行為，霧霾狀況難改善。
解決建議	調整發展速度，轉變發展模式，尋求綠色發展道路。	等待天氣條件改善，如冷空氣轉移或颶風等。	巨觀策略布局、行政執法與監督管理等。	採取固體防護措施，減少污染物接觸。	加強民眾的環境素養教育、號召公眾投身環保活動。

推理裝置

* 資料來源：“Sustainable Food and Agriculture: Stakeholder’s Frames,” by B. van Gorp, & M. J. van der Goot, 2012,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5(2), p. 134 ; 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接著呈現演繹階段量化內容分析結果，以瞭解《人民日報》霧霾報導在框架類別的分佈情形，發現佔比最高者為「環境框架」，高達四成以上（42.8%， $n = 246$ ），包括佔三分之一強的「行動決定論次框架」（33.9%， $n = 195$ ）及近一成（8.9%， $n = 51$ ）的「適應自然次框架」；佔比第二者為「政府作為框架」，有超過三成（31.6%， $n = 182$ ）；其餘包括「健康」（7.7%， $n = 44$ ）、「公眾責任」（7.5%， $n = 43$ ）與「經濟」（5.7%， $n = 33$ ）等框架，均各佔一成不到；無法歸類者則有 4.7%（ $n = 27$ ）。

二、霧霾新聞的框架化分析

研究問題二欲瞭解組成《人民日報》霧霾新聞框架的框架化裝置、推理裝置及這些新聞框架反映的社會、政治或文化脈絡為何。延續前述質化分析的歸納結果，並配合演繹階段量化內容分析的框架類別呈現頻率分布，以下討論將依框架類別佔比高低呈現分析結果。

（一）環境框架

此框架的報導論述多視霧霾作為待解決的環境問題，進而探討霧霾的環境影響與因應措施。誠如表 1 框架矩陣所示，其核心意涵在於人類需與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友好相處，保護環境即是保護人類自身。此框架又可根據框架裝置與推理裝置的差異，具體細分為「行動決定論」與「適應自然」兩種次框架。

1. 行動決定論次框架

佔比超過三分之一的「行動決定論次框架」是《人民日報》霧霾議

題報導頻率分布最多者，顯示《人民日報》基本上將霧霾議題定位為環境問題，並肯定人為改變污染現狀之能動性。

「行動決定論次框架」的框架裝置主要涉及字彙選擇與描述等兩類；字彙選擇方面多涉及諸如「環保技術改進」、「節能減排」、「環保研發」、「尾氣治理」等與實際降低霧霾污染相關的字彙。在描述上多以巨觀為主，如燃煤排放、建築施工等某一生產活動領域；微觀為輔，如「家庭裝修」、「秸稈焚燒」（人民日報，2011.12.19：第 9 版視點）等的因應措施相關內容。在口號的使用上，則以化用或創造口號為主。²

在推理裝置上，「行動決定論次框架」指出人類活動是霧霾污染中的核心問題（問題定義）。其背後的價值在於人類應尊重並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與之友好相處，若漠視或破壞環境終會遭其報復（道德評價）。而霧霾問題如此嚴重乃因毫無節制的人類活動，如「汽車尾氣」、「燃煤和農村的秸稈焚燒」、「施工建設中的揚塵」、「工廠、燃煤電廠的廢氣」（人民日報，2011.12.19：第 9 版視點）等，產生的空氣污染物含量遠超環境的容納和自淨能力，進而導致污染（因果闡釋）。

在承認人為活動是造成空氣品質破壞主因的前提下，「行動決定論次框架」將霧霾污染的責任歸咎於社會中的各個主體，認為在包括工廠、企業、政府、常民等眾主體的共同「努力」下，量變實現質變，形成如今的霧霾圖景，即所謂「每個人都是重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污染的

² 化用，亦稱借用、套用，為文學修辭手法。表現為在借用前人所述語句基礎上進行改造，藉以表達特定的觀點、態度或情感（翟明女，2009）；例如可將原句的某一部分進行替換，以後文中的範例說明，「減排是硬道理」以「減排」一詞替換原句「發展才是硬道理」中的「發展」。

製造者」（人民日報，2013.7.18：第 19 版讀者來信）。

但「行動決定論次框架」的重點不在於分析污染的來源及各來源所佔的權重如何，而在於強調在當前的環境處境下，人類必須且可以為自己對環境犯下的錯誤買單，我們有責任和能力將大氣環境「復原」。因此在措施建議中指出人類需透過自身，即社會各行為主體的行動改變污染現狀（解決建議）。正因為未追責單一社會主體，此次框架提及的因應措施則多針對巨觀層面，譬如某行業某領域減少污染的整體目標等，強調全社會對污染的共同擔責。

「行動決定論次框架」的新聞寫作結構安排主要為「追因+因應」，且通常從區別於和霧霾增減直接相關（如在各項活動中增加或減少污染）的政府、公眾、企業等的特定第三者主體，作為「旁觀者」對霧霾問題進行分析並提出因應建議，這個角色則常由專業領域的學者專家等群體承擔。

除此，文本所提的措施均需依靠人來完成，且合力達到減排目標。有效降低污染行為的背後意涵「人定勝天」的傳統思想，帶有不滿於現狀而艱苦奮鬥、努力爭取之意味（Fan, 2000）。就此次框架的人與環境友好相處之價值觀而言，是儒家傳統思想中天人合一觀念的體現。人類活動需要符合自然規律以達到和諧，若其行為超出自然的承載力，表現為各種污染與破壞，則這種行為的苦果終由人類自己承擔。

另外，「行動決定論次框架」的特色是使用口號作為其框架裝置，例如「減排是硬道理」（人民日報，2013.3.2：第 9 版生態週刊），原句為「發展才是硬道理」，來自鄧小平在 1992 年南方談話時期針對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目標所提（〈發展才是硬道理〉，2009 年 2 月 17 日）。因這句話簡明扼要，亦成為社會生活中常用口號與標語之一，並承擔一定的社會動員與激勵功能，有助於促進民眾向共同目

標努力（付伊，2010；宋彩梅，2013）。除了上述改造前人所述語句的化用口號，亦存在針對特殊情境或事件而創造的口號，如針對霧霾污染的「藍天靠風颳」、「靠天呼吸」（人民日報，2013.3.16：第 7 版兩會特刊）等，其本意在說明在霧霾污染下人類被動等待自然條件改善、天氣轉好的情形，帶有消極色彩；而在該框架報導中使用則意在與文本強調的「積極」因應行動形成對比，具有一定價值評斷。

在新聞中使用口號或類口號的短句等形式可追溯至上個世紀後期，彼時中國的公共生活中口號的使用十分常見，執政黨借助口號實現社會動員之目的。因這種表達方式在語言上一般具有相對固定的結構、重複率高且含義穩定，該用語習慣在新聞報導中得以延續；雖然研究指出改革開放後新聞中口號的使用頻率遠少於 1949 年建國初期階段，但仍存於現今的報導中（付伊，2010）。此一語言特色及其內容所涉均體現了《人民日報》作為中國共產黨之輿論喉舌的特徵，符合「黨管媒體」的辦報理念（夏倩芳，2004），使報導隱含某種程度的宣傳色彩。

2. 適應自然次框架

「適應自然次框架」的篇幅相對較短，多為氣象類。其不到一成的頻率佔比顯示此並非《人民日報》主軸的霧霾議題框架類別。

「適應自然次框架」的框架裝置中主要包括字彙與描述兩個面向。首先，字彙選擇涉及較多的氣象科學專業語彙，如「靜穩天氣」、「氣象條件」、「颳風」、「低壓」、「環流」等；其次，文本中有時出現對未來天氣預測之描述。

就推理裝置而言，「適應自然次框架」將霧霾天氣界定為自然氣象問題，是特殊的氣象狀況之一（問題定義）；並將霧霾的形成歸咎為天氣條件不佳；此情形下污染物難以擴散，聚積在某個地理範圍內進而導

致污染（因果闡釋）。基於人類應順從自然環境變化，不與之抗衡的價值導向（道德評價），提出的解決建議則是等待天氣狀況自然改善，此點與前述「行動決定論」次框架強調人為介入的方式有所差異。

「適應自然次框架」通常會出現在將有霧霾污染前幾天的報導中，新聞多以「氣象報導+歸因分析」為寫作模式。報導通常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概括性描述當前或未來若干天的氣象與空氣狀況，以氣象預測為主；第二部分主要分析近期的未來污染形成因素，或直接陳述原因，或引述氣象專家或環境相關政府人員等觀點，如在標題為〈京津冀近期霧霾多〉的報導中，指出霧霾形成原因為「冷空氣勢力弱、活動頻次低」（人民日報，2014.10.23：第9版視點）。

「適應自然次框架」的新聞論述多未提及人為活動加劇或因應污染等面向，只強調需靜候天氣情況改變。誠如王慶（2014）所指出，報導將霧霾原因歸結為自然因素，這種外部歸因意指霧霾作為「天意／天災」是不可逆的存在，是一種能見度較差的「天氣狀態」，其難以消除乃在情理之中。這種論述方式反映出透過尋求與自然的和諧及被動接受／順應命運的文化意涵（Pan, Chaffee, Chu, & Ju, 1994），但也無形中轉移了社會公眾對政府、相關領域專家等主體的道德壓力，並減輕後者的責任。

（二）政府作為框架

《人民日報》霧霾報導佔比第二高的是略超過三成的「政府作為框架」。此框架論述主要突顯政府在因應霧霾污染時的行動，其核心意涵為政府追求為人民服務，且應維護社會生產生活的有序運行。因此，霧霾問題被歸於政府行政管理範疇內，需由政府在大觀上透過策略佈局、制定規章法則、嚴格執法以及監督管理等手段加以解決。此框架意在強

調政府在霧霾因應中扮演勇於擔責的污染治理之主導角色，助於政府的形象塑造。

雖然「政府作為框架」同樣強調人為因應霧霾的行為與策略，但與前述「環境框架」中「行動決定論次框架」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對霧霾問題性質的界定：前者偏向認定霧霾議題屬行政管理範疇，故將因應霧霾之權責明確指向政府，且在新聞論述中著重樹立政府形象；後者則主張霧霾問題因應需要全體社會的共同參與，未指明特定行動主體。

在框架裝置上，「政府作為框架」主要集中於兩個面向：字彙選擇與隱喻。字彙選擇多涉及政府因應行為的內容且大部分為巨觀層面的行為，例如「健全機制」、「資訊（訊息）公開」、「決策部署」、「績效」、「行動計劃」、「法規」、「問責」、「監管」等詞彙。而此框架多採用兩種隱喻修辭，一為將霧霾視為敵人的戰爭隱喻，因應霧霾則是人類與污染間的戰爭；二則視霧霾為疾病之隱喻，解決霧霾即是治療疾病。

在推理裝置中，此框架論述除了將霧霾界定為政府管理範疇內的民生問題（問題定義），在因果闡釋層面則認為霧霾污染難以解決乃因政府的措施與規劃存在侷限和不足。本著為人民創造更好的生產生活環境是政府職責之價值觀（道德評價），在霧霾的因應建議上則強調政府進行合理的巨觀策略佈局、訂立法規、採取行政手段等措施（解決建議）。

此框架新聞報導的寫作範式主要呈現為「積極的中央／上級政府」與「消極的個別地方政府」兩種樣貌：前者強調中央政府或高級別行政單位在應對霧霾中的積極正向行為，樹立正向的政府領導形象；後者側重描述某些地方政府並未完全執行中央政策，甚至不採取因應措施，形塑不作為的消極被動之個別地方政府形象，並以全國性媒體之姿對此提

出批評。易言之，「消極的個別地方政府」範式報導透過列舉地方政府在因應霧霾中的各項不佳表現，來形塑「錯誤典型」以作為各地政府之警示，敦促其他地方政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出現兩種範式的原因可溯至中國政府行政體系特徵，在現行中央—地方的「平行」政治組織結構下，中央政府負責總體發展方向與政策制定；具體的政策實施則下放至地方政府，由其執行；但權力下放卻是在地保護主義產生的重要驅動力（Chen, 2014; Zhang, 2017a）。在中國大陸當前發展階段下，許多高污染排放的鄉鎮企業是在地經濟的主要支柱。中央政府下定決心治理，但在地政府認為若關停這些企業則會增加地區失業率與社會不穩定因素。對地方權威而言，經濟發展仍是他們的主要任務，也是主要政績的體現；因此放任這些污染企業繼續存在（Chen, 2014; Li, 2013）。

整體而言，「政府作為框架」的社會脈絡可追溯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社會發展歷史。1949 年後，雖然經濟發展成為政府的主要任務，但在宣傳上仍注重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與政策主題，包括在霧霾議題報導中不乏可見的各項因應政策、決策部署等，此種報導的宣傳模式有助於形成強烈的國家意識與國家權威（蔣雲倩，2015）。

（三）健康框架

佔比不到一成的「健康框架」，其論述主要探討霧霾污染與人類健康間的關係，此框架的核心意涵在於霧霾會對人體健康造成損害。相關的新聞文本多將霧霾問題作為公共健康問題形塑，並提供個體因應的建議。

在框架裝置上，「健康框架」多使用公共醫學與健康相關領域的專業字彙，例如「患病」、「惡化」、「健康危害」、「易感人群」、

「慢性炎症」等，同時也出現與人體健康因應行為相關的詞彙，如「室內通風」、「口罩」、「空氣淨化器」等。此外，醫學研究結果作為論據使用亦是其框架裝置的特徵之一。

在推理裝置部分，「健康框架」論述首先認為霧霾問題在社會生活中屬於健康問題（問題定義）；其價值觀基礎在於民眾擁有健康生存的權利（道德評價），為保證這一權利不被剝奪，應及時正確地防範霧霾。在因果闡釋上，該框架則強調長時間曝露於霧霾環境會引起人體系統多種疾病症狀，甚者可能危及生命；基於此的策略建議為民眾需採取防護措施，減少與空氣污染物的接觸（解決建議）。

「健康框架」的報導寫作呈現兩種典型範式，分別為「對健康影響」與「防護的科普」。前者關注醫學領域中空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可能提及污染物吸入會加重如哮喘、慢阻肺等慢性疾病；後者則探討個人在霧霾環境下如何進行科學的自我防護，其中包括一般性防護措施如佩戴口罩、減少出門、使用淨化器等，也可能出現細化的報導僅說明挑選口罩或淨化器中的注意事項，提供常民的防護行為指導。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顯示，霧霾與人體健康的危害息息相關，特別是女性、老人、孩童、具過敏史、心肺疾病的人群以及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弱勢群體（Boldo et al., 2006; Brunekreef & Holgate, 2012; Kan et al., 2008; Peled, 2011），此框架論述在整體分析新聞文本中佔比仍不到一成，凸顯霧霾與個人健康問題仍待多強調。

（四）公眾責任框架

「公眾責任框架」的佔比同樣不及一成，其核心意涵在於公眾對切身相關之事務與問題有責任和義務參與其中並共同解決。此框架同樣承認霧霾是人為因素導致，但與「行動決定論次框架」的不同之處在於對

霧霾污染的責任歸咎存在差異。

此框架命名雖借鏡於西方環境議題研究中使用的公共責任框架（public accountability frame; Nisbet, 2009, 2010），但因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差異，霧霾議題在中國大陸社會情境下並不強調原西方社會聚焦的「爭議」面向，而是側重於對公眾進行環境問題因應或環保行為的呼籲與動員，故稱之為「公眾責任框架」。

在框架裝置上，「公眾責任框架」多使用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相關字彙，如「環保意識」、「行動力」、「全民參與」等，或如「減少油煙排放」、「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個人的減霾行為。新聞文本的描述主要涉及促進公眾參與霧霾因應、實際行動建議以及提升公眾環保意識等內容；除此，此框架論述亦使用具社會動員意涵的口號或標語。

就推理裝置而言，「公眾責任框架」意涵因應霧霾的行動中欠缺公眾參與（問題定義），其背後的價值準則為公眾具有承擔和履行保護環境的責任和義務（道德評價）。目前污染難以改善的原因在於公眾缺乏環境意識、認知與行動參與（因果闡釋），故將責任歸咎於常民，即民眾雖是霧霾的受害者，但「每個人都是污染物的貢獻者」（人民日報，2016.11.5：第9版生態週刊）。由此，需加強民眾的環境素養教育並進行環保實務動員（解決建議）。

「公眾責任框架」的寫作範式依其內容側重分為「主動的公眾」與「被動的公眾」兩類，前者往往透過個案描述樹立公眾參與環保、因應霧霾的典型榜樣；後者則多在報導中呈現為環境意識與認知程度較低的一般民眾，建構其不主動參與環保行為的「消極」形象。

從社會脈絡來看，民眾在因應霧霾中的「事不關己」的態度以及對他人和政府的「苛求」，根源為中國改革開放前，壟斷並包辦所有社會資源與各項公共事務的全能政府模式殘留；長期處於該社會情境中的公

眾對政府形成極深的依賴，缺乏相應的環境意識，與西方公眾的自覺環境權利意識相去甚遠（覃哲，2012）。因此，在中國大陸社會變遷後，為改變民眾的消極環保參與狀況，政府透過公辦教育機構、媒體等管道開展廣泛的社會內部動員。其中口號與標語作為具動員與激勵功能的語言形式亦不乏可見，包括報導為達簡潔易記之目的所創的對仗式、押韻式口號與套語，如「空氣被污染，人人都是排放源；空氣污染了，大家都是受害者」（對仗式）與「減排請從自己起，減排請從今日始」（押韻式）（人民日報，2013.1.19：第 9 版生態週刊）。

除此，對民眾環境意識的培養與素養教育通常訴諸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集體意識與集體主義，亦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群體價值取向一致（鄧紅，2007）；如「今天的社會公眾……就能為構建『美麗中國』添磚加瓦」（人民日報，2013.2.2：第 1 版要聞）；其中「添磚加瓦」消除了民眾的個體性與特殊性，僅強調民眾的普遍性與一般性，是生態環境建設中「不具名」的一份子，達到強調集體之目的。

（五）經濟框架

僅佔 5.7% 的「經濟框架」新聞文本多將中國大陸的霧霾污染視為經濟發展帶給環境的副作用，亦即將霧霾歸咎為國家的社會與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的問題，治理霧霾會對現有經濟模式形成掣肘，暫時阻礙發展速度；但長遠看，因應霧霾污染亦能成為新的發展契機，可藉由因應的具體措施，徹底轉變現有高污染、粗放式的經濟生產結構，探索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易言之，此框架論述強調既然霧霾產生於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應透過經濟手段解決。

在框架裝置上，「經濟框架」新聞論述的字彙選擇多採用經濟領域的專業術語，如「市場調節」、「產業轉型升級」、「經濟增長點」、

「產業鏈」等；援引經濟領域的相關統計數據及口號的使用也同樣是此框架的典型裝置。

在推理裝置部分，「經濟框架」論述多指出當前的經濟發展模式會對大氣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問題定義），相關因應措施會直接影響或阻礙當下的經濟發展速度，但最終這些措施則能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因果闡釋）。此框架背後的價值在於「環境與經濟可以並存」（道德評價），因此在論述中通常緊接著轉變話鋒，說明因應舉措中內含帶動經濟發展的「新」方式，其積極結果比現有經濟發展模式更優越，達到經濟發展與污染治理雙贏。由此便帶出解決建議，包括巨觀的發展方向佈局與微觀的策略措施；表現在報導中則多涉及「調整產業結構」、「改善產業佈局」、「淘汰落後產能」、「尋求綠色發展道路」等內容，反映出因應霧霾對當下的經濟社會有利無害，故暫時適當地放緩經濟速度是應該且必要的。

「經濟框架」的新聞文本多採用「先抑後揚」的寫作範式，先經由總述霧霾治理需要投入大量成本，給經濟社會帶來「嚴峻挑戰」，可能阻礙現有的發展模式，隨後態度轉變，點明「（霧霾治理）蘊含著推動經濟增長的巨大機遇」（人民日報，2014.4.14：第 17 版經濟週刊）；接著以具體措施，如發展新能源汽車等作為切入點，說明經濟手段能促進產業更新與能源替換，不僅有利於環境，更可成為經濟增長的突破點。報導透過抑、揚間的轉折，強調在眼前利益（經濟）與長遠利益（經濟與環境兼顧）間進行的正確取捨。

與前述「行動決定論次框架」類似，「經濟框架」報導多引用上位者或領導人的發言，並從中截取片段作為蘊含社會價值觀的象徵式口號。這種口號不僅作為實際工作執行的核心指導理念，也為報導的價值取向奠定基調，如「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

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民日報，2013.11.6：第 1 版要聞）的說法，便是來自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主席關於生態文明建設的論斷。此論斷從 2012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至今，在各大政治活動中被多次強調，³ 其中「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因其結構工整且喻義明白，頻繁出現於新聞報導中成為口號。

三、新聞消息來源與霧霾新聞框架建構

研究問題三欲探究哪些新聞消息來源在共同建構霧霾議題意義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並比較消息來源在《人民日報》不同霧霾框架論述中的差異。透過演繹階段的量化內容分析，本研究首先闡述霧霾報導在消息來源引述的分佈情形，接著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呈現不同框架使用消息來源之差異。

在霧霾報導七大類，共 11 細類的消息來源類別中，「官方機構」的使用次數最多，佔總體近九成（89.7%， $n = 516$ ），包括近六成（59.3%， $n = 341$ ）的「環境官方」、略超過四分之一（26.6%， $n = 153$ ）的「其他官方」及僅佔 3.8%（ $n = 22$ ）的「經濟官方」；其次為超四成（43.5%， $n = 250$ ）的「專家學者」，包括略超過四分之一的「環境領域專家學者」（26.3%， $n = 151$ ）、佔 16.3% 的「其他領域專家學者」（ $n = 94$ ）及僅佔 0.9%（ $n = 5$ ）的「經濟領域專家學者」；除此，「民眾」所佔比例略超兩成（21.6%， $n = 124$ ），「企業」佔一成左右（10.1%， $n = 58$ ），其餘如「醫療機構及成員」（4.3%， $n = 25$ ）、「其

³ 詳見王子暉（2017 年 6 月 5 日）及卞民德等人（2015 年 3 月 8 日）的報導。

他」（4.0%, $n = 23$ ）、「非政府組織」（1.0%, $n = 10$ ）等消息來源均遠低於一成（詳見表 2）。整體言之，《人民日報》霧霾議題報導以「官方與權威機構」、「學者專家」、及「民眾」三者構成最主要的消息來源。

表 2：霧霾新聞消息來源分佈（ $N = 575$ ）

來源	次數	%
官方機構	516	89.7
環境	341	59.3
經濟	22	3.8
其他	153	26.6
專家學者	250	43.5
環境	151	26.3
經濟	5	0.9
其他	94	16.3
醫療機構	25	4.3
企業	58	10.1
非政府組織	10	1.7
民眾	124	21.6
其他	23	4.0
總計	1,006	175.0

註：因該類目分別記錄單一樣本中每一消息來源的出現次數，分母則以新聞樣本數（575 則）計算，故比例超過 100%。

以上說明《人民日報》在霧霾議題的新聞報導中雖引述消息來源種類多元，但仍相當倚重官方與權威機構，尤其表現在對環境系統的官方

機構與人員的偏好上。其次，對專家學者亦十分重視，特別是「環境領域專家學者」，此一結果與既有科學環境議題的報導研究結論一致（Duan & Takahashi, 2017; Ma, 2015）。《人民日報》霧霾報導多仰賴環境官方、權威或專家消息來源的情形，也與前述「環境框架」佔比較高的趨勢互相輝映。

在其餘五類消息來源中，「民眾」來源明顯高於另四種，按多寡主要分佈於「行動決定論次框架」（9.6%， $n = 55$ ）、「健康框架」（3.7%， $n = 21$ ）與「政府作為框架」（3.3%， $n = 19$ ）中。本研究發現報導引述「民眾」來源時，其內容多為對污染現象之描述或感想，較不涉及巨觀或抽象層面，如對政策或因應措施的態度與看法等。此結果呼應了過去有關中國大陸時政新聞研究的發現，即民眾參與新聞敘事的功能多在於強化國家與政府主體的論述（李朗、歐陽宏生，2014）。易言之，《人民日報》在呈現霧霾議題的社會行動主體與利害相關者中，仍偏重於政府主體。

本研究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觀察霧霾新聞引述的消息來源在各框架上的差異。框架以大類目作為分析對象，⁴ 消息來源則以「官方來源」、「學者專家」、「企業」、「醫療機構」、「民眾」、「非政府組織」、「其他」等七大類為區隔。

在七類消息來源中，僅「官方來源」、「學者專家」與「醫療機構」在霧霾議題不同框架的使用存在顯著差異。本研究將此差異列於表 3。

⁴ 本研究初步比較分析發現「適應自然次框架」與「行動決定論次框架」間未存在消息來源的引述差異，故在整體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中則將此二次框架合併為「環境框架」。

表 3：霧霾新聞各報導框架使用消息來源之差異 (N = 575)

官方來源			
框架	平均數	標準差	事後檢定
a. 經濟	1.09	2.04	
b. 環境	1.00	1.57	b > d***, b > e***
c. 政府作為	1.05	1.44	c > d***, c > e***
d. 健康	0.32	0.74	
e. 公眾責任	0.19	0.50	
$F(4, 575) = 5.34, p < .001.$			
學者專家			
框架	平均數	標準差	事後檢定
a. 經濟	0.39	0.75	
b. 環境	0.57	1.35	b > c*
c. 政府作為	0.24	0.65	
d. 健康	0.68	0.88	d > c*
e. 公眾責任	0.28	1.16	
$F(4, 575) = 2.48, p < .05.$			
醫療機構			
框架	平均數	標準差	事後檢定
a. 經濟	0.00	0.00	
b. 環境	0.01	0.09	
c. 政府作為	0.00	0.00	
d. 健康	0.52	0.93	d > a**, d > b**, d > c**, d > e**
e. 公眾責任	0.00	0.00	
$F(4, 575) = 37.97, p < .001.$			

* $p < .05$, ** $p < .01$, *** $p < .001$.

以「官方來源」在各框架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言〔 $F(4, 575) = 5.34, p < .001$ 〕，事後檢定多重比較發現「環境框架」與「政府作為框架」均分別明顯比「健康框架」與「公眾責任框架」更常引述官方消息來源，反映出此二框架在論述中較重視官方立場。⁵

以「學者專家」來源在各框架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言〔 $F(4, 575) = 2.48, p < .05$ 〕，「環境框架」與「健康框架」的霧霾報導分別較「政府作為框架」報導引述「學者專家」更多。此結果顯示框架的核心意涵與論述重點的不同可表現在對消息來源的偏好上。「環境框架」除了上述體現官方立場，亦需容納專業觀點；故區別於「政府作為框架」，在使用「學者專家」來源上存在差異。而「健康框架」實為專業性質較強的框架類型，因此更需學者專家的意見作為支撐。另有針對霧霾議題下消息來源種類與傳播效果的實證研究顯示，相比於政治決策者，民眾對專業研究者的消息來源認知效果最好（郭瑞超，2016）。

除此，「醫療機構」來源在各框架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F(4, 575) = 37.97, p < .001$ 〕則發現，「健康框架」分別較所有其他的框架更常引述「醫療機構」來源，此乃因「健康框架」報導有較多公共衛生、醫療健康等專業訊息之需求，故對該領域的專業背書需求更甚於來自於官方政府機構的政治或權力背書。

一如前述，「企業」〔 $F(4, 575) = .99, p = .414$ 〕、「民眾」〔 $F(4, 575) = 2.0, p = .088$ 〕、及「其他」〔 $F(4, 575) = 2.34, p = .054$ 〕等消息來源分別在五個框架中的單因數變異數分析均無統計顯著差異。而「非政府組織」〔 $F(4, 575) = 3.329, p < .05$ 〕雖然 p 值 $< .05$ ，僅說明非政府組織作為整體的消息來源，與其他六類消息來源間存在差異，但事後檢

⁵ 本研究的消息來源各組樣本數不同，且結果違反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故使用 Dunnett's T3 法進行事後檢定的多重比較（邱皓政、林碧芳，2014）。

定結果顯示並無框架間的差異存在。

伍、討論與結論

一、結果摘述與討論

本研究在《人民日報》霧霾報導的新聞框架分析部分，透過歸納階段總結出報導使用的五類共六個框架包裹，發現「環境框架」所佔比例最高，呼應前述消息來源數量分佈特徵，顯示《人民日報》傾向於將霧霾議題定位為環境議題。「環境框架」中的「行動決定論次框架」論述則為所有框架類型中報導量最多者，反映《人民日報》對霧霾議題的建構總體立於「人類活動導致污染後果」之基礎；承認人類社會對大氣環境所犯「錯誤」的同時，更傾向於對自然的彌補，該框架文本的論述中始終表達「人類藉由行動可改善既有不良環境現狀」之內涵，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框架在歸咎霧霾責任時認為全社會都有承擔因應霧霾之責任，這種廣泛歸責的方式其實乃模糊了社會對污染追責的認知。

報導量居次的「政府作為框架」論述將霧霾問題界定為行政管理問題，反映出《人民日報》在霧霾議題建構中濃厚的官方立場。此框架的建構也突顯出中國因應霧霾過程中「雷聲大、雨點大」之特色：除了政府採取雷厲風行的實際行動應對霧霾，媒體亦需大力宣傳、強調政府所作所為。除此，此框架報導中對官方政府的行為描述側重於未來的規劃和過去的工作總結。前者顯示政府對於霧霾治理做好充分準備，能夠妥善解決污染；後者表明政府確實採取因應行為，並非向社會開「空頭支票」；兩者的結合有助於形塑政府的正面形象，其建構方式亦符合《人

民日報》作為輿論喉舌之角色。

進一步探究「政府作為框架」之形成脈絡，從中國大陸的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歷程觀之，始於 1970 年代末的環保運動模式基本由「政府主導」，其中政府囊括法規政策制定、執行、監督、以及透過媒體等各種方式進行宣傳的全部職責（王利濤，2011）。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政府屬全能政府性質，在壟斷社會資源的同時亦包攬所有社會公共管理事務；進入 1980 年代後，政府雖然放開全能模式，但仍習於承擔各項事務，使得民眾依然高度依賴政府（覃哲，2012）。這種社會與政府雙方間的「默契」以及民眾的依賴，體現在因應重大污染事件時政府在實際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絕對主導姿態，也同時體現於媒體的報導內容。

霧霾新聞的「健康框架」論述不僅涉及污染物對人體健康造成不良影響的原理與後果，也與對個體如何採取防護進行普及化宣導有關。此框架在霧霾新聞中的報導量排第三，顯示環境污染議題中，與人類切身相關的利益（健康權益）是值得關注的面向之一。2015 年中國大陸三省居民的環境與健康素養調查結果令人擔憂（〈環境與健康素養調查結果不樂觀〉，2016 年 11 月 1 日）；另有實證研究指出民眾對霧霾風險的因應認知不足（趙思茹，2016）。從這個角度看，「健康框架」的出現可幫助提高民眾的環境健康素養。然本研究發現此框架報導所佔比例不及一成，是未來在實務報導上可思考增加之論述。

「公眾責任框架」論述視多數民眾為不積極投身環境保護被動的主體，因此需透過媒體進行動員與號召。此框架的社會根源與「政府作為框架」類似，即在如前述政府壟斷並包辦所有社會資源與事務的全能模式殘留影響下，個人對環境污染因應的參與度不高，仍期待政府解決環境問題。基於改變民眾被動現狀的訴求，媒體呼籲公眾的環保積極性成為重要方式，因此此框架報導的宣導意味明顯，也處處可見標語口號。

然此框架報導所佔比例不及一成，顯示提升民眾的積極行動並非主流官方媒體報導建構霧霾議題的重點。

最後，「經濟框架」的論述建構根源與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有關。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實施一系列經濟改革和措施，國家工作重心轉移至經濟建設，經濟也因此佔據社會發展的中心地位。然一味追求經濟所造成的環境惡果逐漸受到重視，社會菁英群體開始探討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間的關係，力圖找出妥善的發展模式以實現經濟與生態的共贏也因此出現在媒體報導中。不過「經濟框架」的最低佔比報導數量觀之，霧霾新聞的論述建構重點仍非經濟發展，或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的矛盾。此與《人民日報》在氣候變遷這一具跨國性環境議題的報導以經濟發展框架為主軸的研究發現（謝孟哲，2010）有所不同。本研究認為《人民日報》建構不同環境議題報導的差別根源在於議題性質的差異，即霧霾作為國內環境議題，相比於氣候變遷或全球暖化等國際性環境議題，不存在對外與國際間主體進行「利益」爭取的論述情境，故較能回歸因應環境問題的實務性本質進行建構。

在結合新聞框架與消息來源二類目的分析發現，不同框架核心意涵與論述重點的差異，會反映在其使用的消息來源種類差異上。例如「環境框架」相較於「政府作為框架」，其討論的重點更巨觀且綜合，因此除了同樣偏好「官方來源」，「環境框架」還偏重「學者專家來源」，而「政府作為框架」則無此特徵。「健康框架」論述焦點與內容具較強的專業性特徵，故對「學者專家」與「醫療機構」來源的重視程度更高。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中國大陸全國性主流官方媒體在以霧霾為例的環境污染議題建構中存在以下明顯特色：

首先，雖然框架的數量分佈顯示霧霾議題實質為環境議題，但在

《人民日報》的相關報導中明顯帶有政治新聞之特徵，使環境議題建構偏向「環境+政治議題」，此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為強調政府主體在污染因應中的作用與行為。「政府作為框架」是《人民日報》霧霾新聞的第二大報導框架，除了文本中出現較多政策主題，相關新聞也多在肯定、強調政府在污染因應中的主導地位。除此，霧霾報導出現不少宣傳性標語和口號，其中不乏政治化意味濃厚之口號，特別是在「環境框架」中的「行動決定論次框架」、「政府作為框架」及「公眾責任框架」中。標語口號的使用不僅是一種宣導方式，也是社會動員的重要工具（付伊，2010）。在環境議題報導中，透過簡化或化用領導人言論作為標語，可明確強調中央對相關議題的定調與導向。標語口號的使用可溯及中國環境保護發展歷史中對宣傳的需要，中國首任環保局長便曾指出「中國的環境保護事業是靠宣傳起家的」（覃哲，2012）。鑑於當前中國民眾環境意識仍然缺乏、環境健康素養依舊有限，環保「宣傳」被視為有其存在的必要與社會意義，而藉由媒體進行宣導仍是中國大陸「社會教育」的重要途徑。

其次，環境污染責任歸屬的分散，可轉移負面事件中的社會究責，此表現在兩個面向，其一為在污染成因歸咎的報導中缺少明確被指責的主體，如「適應自然次框架」便將成因歸於自然條件，呼應了過往的研究發現（王慶，2014）；「行動決定論次框架」則將成因歸於泛社會主體，如此便不容易聚集強大的輿論壓力，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媒體維持社會輿論的穩定。至於環境污染究責轉移的第二個面向，霧霾新聞的「行動決定論次框架」與「公眾責任框架」均傾向於將社會大眾納入霧霾「元兇」的論述中，使得置身其中的每一個人沒有立場指責他人或組織機構。

再次，《人民日報》在建構霧霾議題的過程中側重於樹立官方，尤

其是中央政府的正面形象，並強調其正確性與主導性，此同時體現在消息來源的引述及新聞框架建構上。包括對「官方來源」的倚重，以及本研究「政府作為框架」中的「積極的中央／上級政府」範式，和同一框架的「消極的個別地方政府」範式、「公眾責任框架」中之「被動的公眾」範式，透過正面樹立與透過個別地方政府與公眾的負面形象塑造，反襯出中央政府在污染因應中的正面與光輝。這項結果也呼應既有的研究發現（Liu & Li, 2017），即無論中國大陸對內媒體（《人民日報》）、對外媒體（《中國日報》）、或主流傳統媒體的社群平台發文，均具備此特徵（Yang et al., 2019）。

最後，《人民日報》在霧霾報導的消息來源選擇上對「官方機構」表現出明顯的偏好，此一傾向在針對該報一般性環境報導的相關研究中亦有所發現（黃河、劉琳琳，2014）。一如文獻探討所示，中國大陸傳媒制度的變革並未更改傳媒集團的事業單位性質，即仍為國有性質（黃玉波、張金海，2006）；輿論喉舌作為新聞承擔的角色之一，使報導受到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規制（王慶，2017）。另有學者指出，記者在長期新聞實務中積累並形成相對固定的消息來源資源，被稱為「常規來源」，在中國大陸的媒體語境中，則以政府官方人員、專家精英、以及行政與社會機構負責人為主（黃河、劉琳琳，2014），以上共同導致媒體在報導中對官方來源的依賴。

另外，對「官方機構」來源的偏重看似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科學與環境議題報導側重「專家或權威系統」有所差異；中國大陸的社會語境下，各行業的專家或直接屬於國家行政機構與部門（王慶，2017），或屬於與主導政治權力相關的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有些專家同時具備專業權威和政府官方權威雙重身份，例如「廣東省環境監測中心副主任、省大氣環境保護首席專家鐘流舉」（人民日報，2013.6.5：第4版要聞），亦即在某種程度上專家群體並非完全獨立於政府官方。政治力量

直接或間接地將專家吸納進政治體系中，進而政府官方不僅在意識形態上統攝專家群體（王慶，2017），同時獲取特定議題的專業與科學上知識論述和建構的合法性。因此從社會語境的角度考量，所謂差異並非消息來源本質上的差異，更多為編碼與數據表象上的區別。

二、研究意涵

過去聲稱是霧霾議題新聞框架的研究數量雖不少，但大多未能充分闡明框架的建構過程，或直接以文本主題或框架功能作為框架類型的劃分。為彌補此不足，本研究運用 van Gorp (2007, 2010) 提出的分析取徑，透過框架裝置與基於框架功能延伸出的推理裝置，耙梳霧霾新聞框架建構的背後邏輯，以更周全的新聞框架分析架構，有系統地檢視作為中國官方喉舌的主流媒體如何再現霧霾議題，一探環境相關政策與媒體建構的關係。

運用上述新聞框架分析取徑使得本研究能特別針對霧霾議題建構背後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情境等因素進行探討。中國大陸的環境政府管理、環保活動以及媒介系統運作模式特徵均可能對新聞框架的選擇產生一定影響（Chen, 2014），需要納入考量並探尋霧霾議題所處的東方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下的社會情境與文化脈絡對新聞報導框架建構之影響。例如本研究發現中國大陸媒體所有權結構導致的輿論導向特色、環保工作的宣傳性特徵、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運作模式下民眾與政府間關係殘留與延伸、傳統文化與社會集體意識與集體主義、以及發展型國家固有的經濟與環境衝突思維等（杜文苓、周桂田、王瑞庚，2017），均為報導框架建構的情境因素。此分析方法與架構在中國大陸霧霾議題新聞研究中尚屬創新，本研究亦藉此延伸了理論方法的適用範圍。

在新聞實務方面，本研究透過揭示中國大陸官方主流傳媒中環境議題新聞框架建構的邏輯，期冀促進環境傳播與素養教育實務人員反思當前環境污染新聞報導與議題建構的模式，並進一步幫助推動環境素養教育之策略製定。其中《人民日報》霧霾議題報導集中於「行動決定論次框架」與「政府作為框架」兩類，未來新聞實務可考慮提升框架呈現的多元性。例如，在環境污染議題中一般民眾可能更重視健康影響等與己利益相關的內容；既有研究指出將霧霾以健康威脅形塑時，相關訊息在社群網站上的擴散範圍更廣（Chris & Elizabeth, 2015），因此加強「健康框架」的霧霾報導可滿足民眾需求並有助於議題的傳播。鑑於相關研究顯示中國民眾對霧霾風險因應認知不足（趙思茹，2016），對環境與健康的素養水平令人擔憂（〈環境與健康素養調查結果不樂觀〉，2016年11月1日）；另在霧霾的健康報導中，污染的健康風險和影響背後原理等內容並未得到充分闡述，故若重視官方動向的傳媒能更強化健康框架的霧霾報導，對提升民眾的環境與健康素養相信能有助益。

三、研究限制與研究延伸建議

本研究雖試圖對《人民日報》霧霾議題報導的新聞框架建構進行系統性分析，仍存在一些研究限制。本研究僅從議題的新聞文本檢視框架架構，故只能透過文本，以及相關文獻與資料，推斷新聞論述背後的框架，可能與真實產製中的框架形成、社會脈絡對其的影響有所落差。就新聞樣本的抽樣與編碼過程而言，本研究聚焦於文字部分，並未將視覺圖像等其他可能作為框架建構元素的部分納入考量，此為另一限制。另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曾就「框架類型」與「時間」進行交叉分析，分別檢視報導框架在「年份」與「月份」兩個不同時間點的分佈狀況是否

達統計顯著差異。但無論以「年份」或「月份」為分析單位，均有超 20% 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無法進行進一步卡方檢定；另，從描述性資料的初步檢視則發現所有框架類型在時間上的分佈大約一致，並未發現主要框架因重要事件或政策施為有轉移情況發生。限於篇幅，加之以研究者希望能更聚焦於「框架建構的邏輯及其社會情境脈絡分析」之重點，權衡再三後做出取捨，並未就框架在時間序上的變化多做分析。然此決定並不排除環境議題報導框架的轉移仍可能存在「事件導向」之特徵，此在過去既有研究中已多所闡述，未來延伸研究也可持續剖析比較。

除此，作為結語，本研究建議未來霧霾議題新聞研究延伸可考慮以下幾個面向：首先，近年來臺灣亦深受霧霾困擾，多見諸報端，而兩岸意識形態與媒介系統差異甚大，對同一環境污染議題的報導與探討實具比較研究之價值，故透過比較不同文化環境之媒體的報導分析，可對兩地文化脈絡之差異的把握更加明晰。

其次，就報紙此傳統媒體言，未來研究可以向前後兩端拓展，包括向產製端，即與新聞產製者就該議題的新聞寫作過程直接溝通，探察新聞文本框架形成背後的主觀影響因素；或向閱聽眾端延伸，檢視新聞文本之框架與閱聽眾所理解之框架間差異，以輔助評價霧霾議題傳播的效果與價值。

最後，中國大陸目前媒介融合趨勢已為主流，傳統媒體紛紛開設網路與新媒體平台。《人民日報》在報端與社群媒體上針對相同議題的訊息傳播也有所不同，例如社群媒體除了有小編引介，其再現的文本也被視為較為軟性（方惠、古俊生、孫小婷，2015），因此可推斷不同媒介平台上的關於霧霾議題報導框架及其分佈勢有所區別，此差異亦值得探究，以全面把握媒體對該議題的建構策略。

附錄：本研究內容分析類目定義

1. 霧霾新聞框架

- (1) 經濟：追求經濟繼續發展為其核心意涵；霧霾本質上是經濟問題，因應霧霾提供了向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契機。
- (2) 環境：追求環境友好，保護環境即保護人類為其核心意涵；霧霾問題實質上是環境污染問題。又可進一步區分成兩個次框架：
 - A. 適應自然：霧霾是特殊天氣與自然環境導致的氣象問題，一旦自然條件改善，霧霾亦迎刃而解。
 - B. 行動決定論：人類活動是霧霾污染中最大的問題，污染解決需要各行為主體的行動加以解決。
- (3) 政府作為：政府追求維護人民生活安定有序為其核心意涵；霧霾因應被納入政府行政管理範疇。
- (4) 健康：以霧霾對人體健康產生不良影響為其核心意涵，探討公共醫療衛生層面的影響與個體因應。
- (5) 公眾責任：其核心意涵為公眾有責任和義務參與公共事務；關注霧霾議題中的公民參與和因應行動，強調公民環保意識與環境素養的培養與號召行動。
- (6) 其他：無法歸類於上述框架者。

2. 新聞消息來源

- (1) 官方機構相關單位／政治人物：包括權力或行政機構及機構中的人員，如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人大代表、國務院、各部委組織及直屬單位、法院、檢察院等司法機構及人員、中央與地方政府機構及人員、及其他國家官方機構與國際組織及

下屬機構。又可分為：

A. 環境部門及下屬各相關機構、政治人物。

B. 經濟部門及下屬各相關機構、政治人物。

C. 其他官方機構相關單位、政治人物：除以上兩類部門外的官方機構相關單位及人員。

(2) 研究機構或學者專家：指在學術界中具備一定專業地位的機構，或在國家機關或政府機構中任職的學者、專家，或相關研究機構中的研究員。又可分為：

A. 環境相關研究機構或學者專家。

B. 經濟相關研究機構或學者專家。

C. 其他研究機構與學者專家：除以上研究領域外的研究機構與人員。

(3) 醫療機構或成員：包括各醫院的醫生、護士等醫療人員。

(4) 企業或企業成員：包含工業、能源、科技等類別下的生產端或銷售端企業、企業成員或發言人。

(5) 非政府組織：不以盈利為目的，從事社會運動的非政府組織或環保團體。

(6) 一般民眾：非官方、業界或社會民間團體的民眾。

(7) 其他：無法歸類至上述各類目。

參考文獻

- 〈發展才是硬道理〉（2017年1月23日）。《人民網》，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7/0123/c410539-29043799.html>
- 〈環境與健康素養調查結果不樂觀〉（2016年11月1日）。《人民網》，取自
<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6/1101/c398004-28824902.html>
- 卞民德、趙兵、吳丹、侯琳良、鞏育華、錢偉、……羅艾樺（2015年3月8日）。〈代表委員議國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新華網》。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lh/2015-03/08/c_127556443.htm
- 尹忠偉（2014）。〈關於「春節霧霾」網路新聞報導的框架分析——以新浪網為例〉，《傳播與版權》，7: 15-16。
- 方惠、古俊生、孫小婷（2015）。〈微信公眾平台在紙質媒體中的角色——人民日報，新京報微信公眾號的文本分析〉，《新聞與寫作》，8: 54-59。
- 王子暉（2017年6月5日）。〈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覆強調「綠水青山」〉，《新華網》。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6/05/c_129624876.htm
- 王利濤（2011）。〈從政府主導到公共性重建——中國環境新聞發展的困境與前景〉，《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1): 76-81。
- 王慶（2014）。〈媒體歸因歸責策略與被「霧化」的霧霾風險——基於對人民網霧霾報導的內容分析〉，《現代傳播》，12: 37-42。
- 王慶（2017）。《環境風險的媒介建構與受眾風險感知》。北京市：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付伊（2010）。〈60年來《人民日報》時政新聞版中的口號套語的嬗變——中國新聞語言現代性進程的一個視角〉，《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2(6): 46-50。
- 田棟、任占文（2016）。〈基於框架理論的外媒中文網霧霾報導分析〉，《中國報業》，11: 38-39。
- 向密（2015年3月2日）。〈柴靜【穹頂之下】引爆網路：48小時視頻播放超2億〉，《Donews》。取自
<http://www.donews.com/net/201503/2882208.shtm>
- 宋彩梅（2013）。《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標語口號分析》。陝西師範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碩士論文。
- 杜文苓、周桂田、王瑞庚（2017）。《臺灣空氣污染之風險治理與制度研究》。臺北市：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 李良榮 (2007)。〈論中國新聞改革的優先目標——寫在新聞改革 30 周年前夕〉，《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4: 1-3。
- 李朗、歐陽宏生 (2014)。〈民生新聞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表徵——兼評「中國新聞獎」部分獲獎作品〉，《新聞戰線》，7: 86-88。
- 邱皓政、林碧芳 (2014)。《統計學：原理與應用》。臺北市：五南。
- 岳璐、方世榮 (2016)。〈風險再現與媒介正義——以《南方週末》空氣污染報導為例〉，《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5: 137-145。
- 林世華 (2016)。〈霧霾報導的媒體呈現——新京報和澎湃新聞相關報導比較〉，《青年記者》，7: 32-33。
- 胡之瑋 (2007)。《從禽流感新聞報導看媒體的風險敘事策略——比較紐約時報、聯合報與蘋果日報》。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夏倩芳 (2004)。〈黨管媒體與改善新聞管理體制——一種政策和官方話語分析〉，《新聞與傳播評論》，1: 124-133。
- 徐美苓、熊培伶、吳姿嫻、施馨堯、賴若函 (2010)。〈台灣人口「問題」的建構：以少子化新聞框架為例〉，《新聞學研究》，103: 43-82。
- 徐美苓、熊培伶、賴若函、吳姿嫻、施馨堯 (2011)。〈是減害還是加害？愛滋新聞論述中的毒癮者框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1: 79-128。
- 徐雲方 (2015)。《〈人民日報〉和〈新京報〉霧霾報導的比較研究——以 2014 年京津冀地區為例》。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論文。
- 高娜 (2015)。〈環境污染的社會講述——以日本四日市市大氣污染為例〉，《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 64-73。
-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2017 年 7 月 25 日)。〈2016 年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摘要版·上）〉，《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網》。取自 <https://www.chinaxwcb.com/info/20958>
- 張伏 (2016)。〈霧霾報導的媒體責任倫理〉，《青年記者》，5: 8-9。
- 張高瑋 (2015)。《〈人民日報〉霧霾報導研究》。山西大學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論文。
- 郭瑞超 (2016)。《專家信源及報導傾向對霧霾報導傳播效果的影響研究》。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論文。
- 曾繁旭 (2009)。〈社會的喉舌：中國城市報紙如何再現公共議題〉，《新聞與傳播研究》，16(3): 93-100。
- 曾繁旭、戴佳、鄭婕 (2013)。〈框架爭奪，共鳴與擴散：PM2.5 議題的媒介報導分析〉，《國際新聞界》，35(8): 96-108。
- 覃哲 (2012)。《轉型時期中國環境運動中的媒體角色研究》，復旦大學新聞學系博士論文。
- 黃玉波、張金海 (2006)。〈從「部分剝離」走向「整體轉制」——當前中國傳媒

- 產業體制改革趨向初探》，《新聞大學》，3: 107-111。
- 黃河、劉琳琳（2014）。〈論傳統主流媒體對環境議題的建構——以《人民日報》2003年至2012年的環境報導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10: 53-65。
- 楊小陽、白志鵬（2013）。〈霧霾天氣的成因及其法律層面應對狀況與操作層面政策建議〉，《中國能源》，4: 6-10, 44。
- 翟明女（2009）。〈語言化用及在城市廣告語中的運用〉，《淮陰工學院學報》，18(6): 35-38。
-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臺北市：三民。
- 趙思茹（2016）。〈大學生霧霾風險認知與應對行為調查研究〉，《改革與開放》，24: 73-74。
- 鄧紅（2007）。〈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社會文化基本價值觀之比較〉，《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3): 82-84。
- 劉宇晨（2017）。〈自我賦權下表達與行動分析——以霧霾段子傳播為例〉，《現代交際：學術版》，13: 64-65。
- 蔣雲倩（2015）。《中國宣傳畫（1949~2008）圖像符號分析》。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碩士論文。
- 謝君蔚、徐美苓（2011）。〈媒體再現科技發展與風險的框架與演變：以基因改造食品新聞為例〉，《中華傳播學刊》，20: 143-179。
- 謝孟哲（2010）。《媒體如何框架氣候談判爭議：哥本哈根峰會之跨國新聞分析》。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Afroz, R., Hassan, M. N., & Ibrahim, N. A. (2003). Review of air pollution and health impacts in Malaysia. *Environmental Research*, 92(2), 71-77.
- Boldo, E., Medina, S., Le Tertre, A., Hurley, F., Mücke, H. G., Ballester, F., & Aguilera, I. (2006). Apehis: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of long-term exposure to PM2.5 in 23 European c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1(6), 449-458.
- Brunekreef, B., & Holgate, S. T. (2002). Air pollution and health. *The Lancet*, 360(9341), 1233-1242.
- Burgess, A. (2015).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isk. In H. Cho, T. Reimer, & K. A. McComas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risk communication* (pp. 121-139).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hang, K. K., Salmon, C. T., Lee, B., Choi, J., & Zeldes, G. A. (2009).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ual factors on the selection of news frames. In G. Golan, T. Johnson, & W. Wanta (Eds.), *International media communication in a global age* (pp. 177-199).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hen, S. (2014).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ises, conflicts, and prospec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 Burnaby, BC, Canada.
- Cheng, P., Wei, J., & Ge, Y. (2017). Who should be blamed?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a city smog event in China. *Natural Hazards*, 85(2), 669-689.
- Chris, C., & Elizabeth, P. (2015). Hazy messaging framing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during air pollution crises. *Proceedings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16-19.
- Duan, R., & Takahashi, B. (2017). The two-way flow of new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newspaper coverage of Beijing's air pollu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9(1), 83-107.
-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 Fan, Y. (2000). A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7(2), 3-10.
-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 1-37.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S. (2017).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haze issue in Chin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bout constructions of People Daily and analysis of audiences interaction in terms of haze issue*. Master's thesis,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Jönköping University, Jönköping, Sweden. Retrieved from <http://www.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1128354/FULLTEXT01.pdf>
- Kan, H., Heiss, G., Rose, K. M., Whitsel, E. A., Lurmann, F., & London, S. J. (2008).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traffic exposure as a risk factor for incident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 Atherosclerosis Risk in Communities (ARIC) study.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6(11), 1463-1468.
- Li, X. (2013). The weak link: Diagnos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factors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issue. *Chinese Studies*, 2(4), 178-184.
- Liu, M., & Li, C. (2017). Competing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China's smog in Chinese and Anglo-American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s: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y.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4, 386-403.
- Ma, L. (2015). The Beijing smog: Between media frame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China Media Research*, 11(4), 6-16.
- Massey, B. L. (2000). How three Southeast-Asian newspapers framed the haze' of 1997-98.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1), 72-94,
- Nisbet, M. C. (2009). Communicating climate change: Why frames matter for public engagement.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51(2), 12-23.
- Nisbet, M. C. (2010). Knowledge into action. In P. D'Angelo & J. A. Kuypers (Eds.), *Doing news framing analysi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p. 43-83).

-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an, Z., Chaffee, S., Chu, G., & Ju, Y. (1994). *To see ourselves: Compa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Peled, R. (2011). Air pollution exposure: Who is at high risk?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45(10), 1781-1785.
- Reese, S. D. (2001). Introduction. In S. D. Reese, O. H. Gandy, & A. E. Grant (Eds.),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pp. 1-31).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Reese, S. D. (2007). The framing project: A bridging model for media research revisite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1), 148-154.
- Rouner, D., Slater, M. D., & Buddenbaum, J. M. (1995, August). *Inability to recognize news source bias and perceptions of media bi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 Tong, J. (2014). Environmental risks in newspaper coverage: A framing analysis of investigative reports 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10 Chinese newspaper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8(3), 345-367.
- Van Gorp, B. (2007). 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framing: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1), 60-78.
- Van Gorp, B. (2010). Strategies to take subjectivity out of framing analysis. In P. D'Angelo, & J. A. Kuypers (Eds.), *Doing news framing analysi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p.84-109). New York, NY: Routledge.
- Van Gorp, B., & van der Goot, M. J. (2012). Sustainable food and agriculture: Stakeholder's frames.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5(2), 127-148.
- Wang, K., & Liu, Y. (2014). Can Beijing fight with haze? Lessons can be learned from London and Los Angeles. *Natural Hazards*, 72(2), 1265-1274.
- Wang, X. Y. (2017, February). *Urban-rural conflict over framework analysis on media discourses of straw burning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Paris, France.
- Wimmer, R. D., & Dominick, J. R. (2013).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10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Yang, F., Wendorf Muhamad, J., & Yang, Q. (2019). Explor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on Weibo: A textual analysis of framing haze-related storie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13), 2374.
- Zhang, Y. (2017a). Digital environmentalism: A case study of PM2. 5 pollution issue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ility*, 7(1), 76-93.
- Zhang, Y. (2017b). *Smog Pollution in China: News Framing and Issue-Attention Cycle per the People's Daily*.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Florida. Retrieved from <https://goo.gl/F2WRDS>

Zu, G. (2015). *Framing pollution: An analysis of the coverage of air pollution in China in 2013 by ChinaDaily.com*.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Scripps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Ohio University, Ohio. Retrieved from <http://www.ohiolink.edu/etd>

News Framing of Haze in People's Daily in China (2011-2017)

Zitian Li, Mei-Ling Hsu *

ABSTRACT

The haze problem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ociety, media, and thus the communication academia. Given that existing related media studies have not thoroughly clarifie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 logic of news framing, this study analyzes a total of 575 haze articles from China's mainstream official press, *People's Daily*, from 2011 to 2017. By adopting van Gorp's inductive-and-then-deductive analytic approach,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haze issue is framed mostly as an environmental problem calling for human action and a problem focusing on governmental actio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experts have been quoted the most, but they function differently by news frame. The results also reflect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orces underlying the news framing of haze in China. The study ends with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news practice.

Keywords: *People's Daily*, framing analysis, new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ze.

* Zitian Li 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Mei-Ling Hsu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Taiwan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mlshiu.mlh@gmail.com.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四二期 2020 年 1 月